

我父亲的“三严”

我的父亲宋时轮将军原名宋际尧,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醴陵北乡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却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无限热爱。无论是打仗、搞军事科学研究,还是对子女的教育,父亲都是以著著称,处处体现出“严守初心、严格治军、严以修身”的“三严”作风,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严守初心——三次入党

父亲传奇的一生动人心魄,三次入党的经历扣人心弦。1921年,父亲进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与左权是同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抨击时弊,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1926年4月13日,父亲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后经复试顺利成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入校后,父亲的各项科目成绩都比较好。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了半年多医院。其间,父亲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黄埔军校将父亲转入第六期学习。1927年1月,父亲由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张庆孚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父亲刚入党没多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父亲在广州被捕入狱,关了两年。直到1929年4月,经共产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父亲被释放。出狱后,父亲从广州转移到香港,等待接转组织关系。这期间,父亲在住处附近巧遇老同学李适生,李适生硬要拉他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工作,两人因意见相左发生了争执,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父亲担心节外生枝,没等在香港接转好组织关系,就于当

晚匆忙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父亲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眼看钱要花完了,无奈之下只好辗转回到家乡醴陵。

回到家乡后,父亲白天上山躲避敌人搜捕,晚上下山宣传、发动群众。他想,就算一时找不到党组织,也要拉起队伍闹革命。他对家里人表明立场:“我要继续干革命,跟地主、军阀势不两立。”这期间,父亲化名“张司令”,带领这支被当地人称为“黑杀队”的组织,在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打游击。

1930年初,父亲旧病发作,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父亲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他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六军。

1934年初春,父亲到红军大学学习。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红军大学组织学员在星期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父亲因为有旧伤,挑不了太重的东西,挑泥时,父亲对负责上泥的学员说:“以后能否少装些呢?”可没想到,他挑下一担的时候,装得更重。父亲的火爆脾气是有名的,他说:“我是自愿来帮助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做苦工的,你为什么这样做?”回到红军大学,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说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学校便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等原因,给予父亲开除党籍3个月的处分。说是3个月,但随后红军就开始长征了,父亲的党籍问题也被搁置。一直到了陕北,当毛泽东委派我父亲去红十五军团担任作战科长时,父亲才含着委屈说:“作战科是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的非党员干部去,合适不?”毛泽东问:“怎么回事?”父亲如实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毛泽东谈话后,被排

斥在党组织外一年之久的父亲,由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第三次入党。

严格治军——带出过硬队伍

父亲一贯坚持从严治军的原则,他带部队突出一个“严”字,严格管理,严格要求。1947年2月,由渤海地方武装升级而成的华野第十纵队成立,父亲任司令员。对这支部队的建设,他花费了大量心血。纵队建立伊始,他就狠抓部队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培养,结合实际开展严格教育,拟定规章,严格管理。他要求各级干部和队伍在严酷的战争中经受考验,树立起敢打必胜的信心,培养英勇、顽强的作风。他建立教导队、训练队,对骨干进行短期培训,亲自讲课,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使部队迅速掌握克敌制胜的本领。在父亲的带领下,十纵在解放战争中由小变大,由弱转强,成长为一支能打大仗、硬仗和恶仗的队伍。

在国民党军队精锐云集的华东战场上,父亲率领十纵屡战强敌,特别是在几次事关全局的战斗中,十纵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浴血拼杀、所向披靡,以至于在国民党军中流传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1948年,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团团围住,父亲奉命率领华野十纵,在桃林岗阻击前来救援的邱清泉兵团。蒋介石和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乘飞机亲临上空督战。邱清泉使出浑身解数,下了“进攻不成,按级斩首”的死命令,飞机、大炮、坦克、毒气全都使用上了,多次组织部队反复进行集团冲击,想杀开一条血路。父亲要求部队“寸土不让,顽强死打,适时组织反击”。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5昼夜的血战,桃林岗阵地始终坚如磐石,敌人无法前进一步,眼睁睁看着20里外的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全歼。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在上海战役前,父亲就带领参谋看地图查资料进行精确计算,将上海划分为

五个警备区域,设置5000多处岗哨,任务下达给各军,因此上海一解放,就迅速展开警卫。部队进驻上海期间严守纪律。全军看管16处仓库,库房内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官兵愣是没动过一块银圆。解放军遵纪爱民,成为闻名于世的正义、文明之师。

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在和平时月仍然从早忙到晚。父亲任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时,我经常看见,夜深了父亲办公室里的灯光还亮着;清晨我醒来,父亲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他一大早就去部队检查出操和内务情况去了。由于过度劳累,父亲的头发过早地全白了。我曾对父亲说:“有人反映你要求太严了,大家都怕你。”父亲告诉我:“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带出过硬的队伍,才能打硬仗!”

严以修身——不搞特殊化

父亲要求我们子女要严以修身,夹着尾巴做人,不准搞特殊化,做个普通劳动者,自己去经风雨见世面。父亲从来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子女谋福利,我们姊妹没有一个做大官、发大财的,都在平凡岗位上做贡献。

我上幼儿园时,假期在家里吃饭,吃饱后碗里还剩下口饭菜,父亲让我吃完,我不肯,他就与我一起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讲农民种粮食不容易的道理。可我眼泪汪汪的,任凭父亲好说歹说就是不肯吃。父亲后来火了,拍着桌子逼我吃,我磨蹭了半天,拗不过父亲,最后不得不吃光了碗里的饭菜。从此我养成了饭菜一定吃干净的习惯。

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后来在部队农场接受了两年再教育。1970年,组织分配我到学校当教师,2000年退休。和我一同学习、工作的人大都不知道我是宋时轮的女儿。我们从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没有依靠父母的关系,为自己谋个好出路。我们没有继承父亲任何物质财富,却得到了父亲珍贵的精神遗产。

(据《学习时报》)

陈秋辅:革命骨干以身报国

陈秋辅,原名陈秋补,别名陈春、陈一夫,海南省琼山县(今属海口市)大致坡镇排城村人,1900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考入琼崖中学(今琼台师范学院)后,陈秋辅开始接触到思想进步人士。毕业后,陈秋辅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和同在上海读书的琼籍学生许侠夫、符福山(符向一)等人共同创办了《琼崖讨邓月刊》,揭露封建军阀的罪行,宣传新文化。1923年,陈秋辅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沪回琼不久,陈秋辅被任命为

嘉积农工职业学校教务主任兼任政治训育主任,与校长雷永铨一起,以广州农讲所为典范,对学校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1926年,陈秋辅调任琼山中学教务主任。这期间,他利用空闲回乡时间在排城、高魁、京化、定田、中秋、良官寨等多个村庄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在短期间里建立了高魁、京化村的农民协会,组织起农会自卫军。

1927年,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授

命冯继周(冯白驹)、陈秋辅、冯裕江三人组成中共琼山县委员会,其中,陈秋辅任宣传委员,负责十二区的革命斗争活动。上任后,陈秋辅和十二区区委书记郭荣在良官寨村后坡祠堂召开了多个村庄的党员会议,成立了七村乡党支部,并组织七村乡党支部集中各村农会的自卫军,到偏僻林密的荆竹庙堂进行军事训练。

当年11月的一个深夜,陈秋辅带领七村乡、金堆乡等地自卫军袭击蛟塘墟,驻敌闻风逃跑,自卫军烧毁了敌人的楼炮、营房。同年底,陈秋辅率领

九、十、十一、十二区部分自卫队自卫军和群众,再次进攻大致坡敌炮楼,取得胜利。

1928年2月18日至21日,琼崖召开第二次党代会,陈秋辅被选为特委委员。年底,接任中共琼山县委书记。

上任不到一年,在1929年7月26日,陈秋辅率领县委武装进攻博布民团据点时,由于叛徒出卖,县委武装遭博布民团埋伏袭击,战斗中陈秋辅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

(据《海南日报》)

